

Debunking Economics

THE NAKED EMPER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经济学辨析

——社会科学的一袭皇帝新衣

[澳] 斯蒂夫·基恩 / 著

霍彦立 王艳萍 / 译

董红霞 牛筱颖 / 校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经济学辨析

——社会科学的一袭皇帝新衣

作者：（澳）斯蒂夫·基恩

翻译：霍彦立 王艳萍

校对：董红霞 牛筱颖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辨析：社会科学的一袭皇帝新衣/（澳）斯蒂夫·基恩著；霍彦立、王艳萍译.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017-7724-2

I. 经... II. ①基...②霍... III.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 IV. F0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7150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网 址：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张晓楹 吴航斌

责任印制：石星岳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16

印 张：23.25 **字 数：**380千字

版 次：2007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册

书 号：ISBN 978-7-5017-7724-2/F·6430

定 价：4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68344225 68369586



Debunking Economics

THE NAKED EMPER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 关于作者

斯蒂夫·基恩 供职于西悉尼大学，最著名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之一，媒体风云人物，关注社会百态，破解经济乱码，纵横驰骋于经济思想史和金融证券学等领域；特立独行，思想深邃，目光敏锐，笔锋犀利，直指“赤裸皇帝”，激活“沉闷科学”，重新构筑经济学大厦之根基，探索开辟经济学巨轮新航线。



□ 关于本书

本书作者斯蒂夫·基恩是一位独自行道的经济学家，他用怀疑主义的眼光审视经济理论与实践。本书在剖析新古典正统经济理论的缺陷以及植根于这类理论的政策种种弊端方面，可谓酣畅淋漓。本书写作致力于打破正统经济学的思维霸权，目的之一在于“能鼓励经济学家们以正确、认真、冷静的态度对待经济理论，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接受这些经济理论时太缺乏评判思维了。”

斯蒂夫·基恩的声音不属于大行其道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主旋律，然而，倾听另类声音的必要，正如约翰·斯图亚特所说的“当人们被迫听取两方面意见时，总是有希望的；一旦他们只听一面之词，谬误就凝固成偏见了”。翻译、出版此书的目的也正在于彰显一种兼容并蓄的精神，并为经济学者、学生和普通读者增添一个审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视角，从而在谬误、真理、偏见之间，有一个分明的评判。

责任编辑/张晓楹 吴航斌

封面设计/白长江

出版说明

《经济学辨析——社会科学的一袭皇帝新衣》是澳大利亚学者斯蒂夫·基恩的得意之作，经学者移译，由我社出版。为此，我社有以下特别的说明：

第一，作者本人对于自己笔下的世界，无疑要比不相干的旁人来的情感热烈，对此我们要有设身处地的理解，这在学术训练有素的读者，是一种成熟的修养。作者怀着热烈的情感，豪迈的斗志，发言明决，论证有力。本书语言生动，较之常见的经济学著作，它的篇幅更见文学的修辞，读者想必也更能感受到情感的洋溢，但“笔锋常带情感”，这也仅仅是作者的一种语言风格，本身并不能成为观点的当然论据。

第二，学术既是天下公器，当然不该走私有专论的路，所以，为学科发展与知识进化计，诸子争鸣、多有论辩总比一锤定音更为可取。本书的引进与出版，旨在别开一方视角，提供新的声音，传播新的思想。至于视角是否高屋建瓴，俯视一切真相；主张是否浊世清音，振聋发聩；或者，本书所传达的学术思想，是否深邃致远、居高神妙。在一个出版者的角度，更多是在底线之上取兼容并包的学术宽容，而不担当学术的裁判，一切是非加减，一切“是否”疑诘，留待学界的评定言说。

第三，作者生活在南半球，人情不同，风物有别，对他所持的政治观，我们不强求一致。然而对于本书存在的诸多政治论点，涉及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表述，在我们的立场，并不认同。但为顾全原著的完整与统一，力遵原貌，我们在此提醒读者注意这种可能性，在阅读中明辨是非，充分发挥唯物辩证方法论，取批判的思维，而不是盲从的态度。

学术发展不能脱离思想的碰击，思想的碰击首先须有论辩的资料，对此，我社有心有志，继续为我国学界介绍、引进、出版更多的优秀作品。路阻且长，祈望读者多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推动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年6月北京

序 言

在《通论》的序言中，凯恩斯说到，他的写作是一个“逃避惯性思维和习惯表达”的漫长过程。他吁请其专业经济学家受众同样要突破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并写道：

“本书以如此艰难的方式所表达的思想却简单而明确。困难之处不是如何表达新思想，而在于如何逃避旧思维。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受其哺育而成长起来的人而论，这些旧思维已经深入到我们头脑中的每一个角落。”（凯恩斯，1936）^①

后来的事情不幸被这一论述言中了。凯恩斯本人的回避是不彻底的，《通论》中包含的传统思想残余遮盖了其许多最具创新性的方面。面对熟悉的旧学说与陌生的新思想的大杂烩，凯恩斯的大批受众发现，更容易将其新思想视为无非是对旧思想的翻修粉饰。凯恩斯曾给经济学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经济学家又在围绕这一冲击重构“传统的思想和说法”。伴随着这一过程，凯恩斯革命死了，缓慢但在劫难逃。经济学没有实现凯恩斯所吁请的规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经济学开始日益近似凯恩斯希望经济学摒弃的“旧思想”。

大约30年前，我就开始在这种复辟传统——称为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导致我回避这一教义的因素极为简单：我大学一年级的微观经济学老师指出了传统经济理论在应用中的一个简单微小却昭然可见的缺陷。

市场经济学理论认为，任何形式的联合，工人组成的工会或制造商形成的垄断，都将降低社会福利水平。从而该理论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工会和垄断，世界将更加美好。收入分配经济理论认为，如果我们摆脱工会和垄断，那么，人们的收入实际上将唯一地由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来决定。世界将兼具效率与公平。

但如果你同时面临工会和垄断，那么情况会怎样？仅消除其中一个会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吗？

^① 本段的翻译直接引用高鸿业先生翻译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序，第3页。——译者

答案斩钉截铁：不！如果仅仅解散工会，那么，根据“保守”经济理论，工人将受到剥削：他们的所得将大大低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同样，如果仅仅破除垄断，那么，工人将剥削厂商）。如果有其一，那么，再配上另一个，人们将会过得更好；人们朝着经济学家的理想乐土迈进一步，不是走近天堂，而是奔向地狱^①。

我觉得奇怪，表面固若金汤的经济学理论是那么的脆弱不堪。在表面上似乎不言自明的论点——消除工会或垄断将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在深层次上变得问题重重，甚至矛盾百出。

在我读大学或研究生时，如果我发现了经济学理论的脆弱性，当时修经济学的学生通常就学习这些东西，那么，我极有可能像许多经济学家一样乐意对此加以掩饰。因为我是“偶然”了解到这一脆弱性的，我便立即对经济原理过分简化的表述产生怀疑。如果连竞争与收入分配这样关键的概念都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推翻，那么，经济学殿堂里还有哪些东西是陈腐的？

这种怀疑主义启动了一个渐渐地发现过程，使我认识到，我起初认为属于经济学的教育实际上比说教灌输强不了多少。一场关于经济理论有效性的理论论战早在我成为大学生的十几年前就展开了。然而，这场论战在标准的大学本科或荣誉学位课程中却不曾出现，除非某位特立独行的导师提及它。有许多同传统经济学分庭抗礼的思想流派，它们同样也被忽视，除非教师中有特立独行者。

在我这个怀疑论者的知识旅程持续了30年之后，我完全摆脱了深深困扰凯恩斯的“传统的思想和说法”。有许多像我一样的非正统经济学家，正尝试给经济学奉献一种新的、更为深刻的方法。

但全世界的大学依然在粗制滥造大量的经济学者，他们相信比如如果消除工会或垄断世界将会更加美好。

更糟糕的是，在过去的30年间，整个世界的政治家和官僚们都把经济理论视为关于现代社会治理方式的唯一智慧源泉。世界被按照经济学家的想象加以重塑。

经济学理论的这种支配地位没有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相反，它给已经麻烦重重的社会雪上加霜：更不公平，更不稳定和更低“效率”。

为什么经济学固守一种业已全面显示出缺陷的理论？尽管经济政策存在消极作用，可为什么经济学依旧是政治家和官僚们处理几乎所有社会经济事务的工具？

^① 这实际上是“次佳理论”的一项应用（兰卡斯特和李普赛，1956）。简单地讲，兰卡斯特和李普赛揭示，迈向经济学描述的理想状态的任何一步都降低福利，如果从现有状态到理想状态需要一步以上的話。

答案在于世界各大学经济学的教学方式。

当我成为学术型经济学家时，我意识到，我的同事中几乎没人对经济学中的这股激流有所了解。大多数人对给予正统思想的批评只是简单地不屑一顾，并且同样蔑视显示出非传统思想倾向的同行。

这倒不是因为这些传统经济学家们是反对知识的——远不是这样。即便传统经济学有缺陷，要掌握其原理依然需要劳其筋骨苦其心智——就像你很快看到的一样。经济学家仍旧拒绝考虑对经济理论的任何批评，即便这些批评来自其他经济学家，并且符合严格的学术标准。

他们也不是动机不良——他们中的大多数真诚地相信，如果人们遵从经济理论原理，世界将会更加美好。对一批信奉个人享乐主义哲学的人们而言，在他们献身于被他们视为社会公益的事务时却是相当的利他。然而，他们所推进的政策常常在非经济学家看来是破坏而不是完善社会结构。

他们还断然否认任何关于他们受到意识形态驱动的说法。他们说，他们是科学家，不是政治积极分子。他们推荐市场解决方案，不是因为他们本人是亲资本家派分子，而是因为经济理论证明了市场是决定经济事务的最佳机制。但事实上，他们所推崇的每一件事情，至少显得有利于富人而不是穷人，有利于资本家而不是工人，有利于特权者而不是弱势者。

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表现出如此反对知识的、具有明显社会破坏性以及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行为，有着比表面上的个人反常更为复杂深刻的原因。实际上，他们受教育的方式赋予他们的不是冷静客观的知识分子个性而是狂热分子的行为特征。

正如与某种神秘宗教信奉者打过嘴官司的人所了解的那样，你根本无法同狂热者就基本信条进行任何争论。在同经济学家有了许多类似的经历以后，我不再幻想我能够说服忠实经济学家们明白事理（尽管这也有奇怪的例外）。我反而喜欢付出时间为经济学另辟蹊径，劝说他人不要迷恋传统理论的一些貌似有理却具有根本缺陷的论点。

因此，凯恩斯的目标读者只是其同行经济学家，与此相比，本书关注的是一个更广大的读者群。而我的基本目标市场是所有那些感到自己被经济学压制而哑口无言的人们。经济学家成功地掌控社会政策的诸多原因之一，就是在与任何反对其政策建议的人的较量中他们夺取了知识制高点。本书的目标就是揭示这种断言是荒谬的。

尽管我是本书的唯一作者，理当对所有的错误疏漏负责，但对书中的亮点却

不能独享殊荣。尤其是经济学领域批判思维的先驱者们赐予我很多很多。

这些先驱者中杰出卓越的就有皮埃罗·斯拉法——一个非经济学家几乎无人知晓但经济学家也鲜有人知的名字。书中还有其他一些人物——略微列举几个，布拉特，加伦盖尼，古德温，卡莱茨基，卡尔多，凯恩斯，明斯基，凡勃伦。但没人具有斯拉法的巨大影响。

我感激芸芸信众中寥寥几个像我一样特立独行的教师。杰出的弗兰克·史迪威——我大学一年级的老师，许多年前他让我接触到了传统经济学诸多缺陷中的第一个缺陷。我也非常感谢特德·惠尔赖特有关各种经济思潮的渊博知识，它对我学术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在澳大利亚经济思想史学会（HETSA）的同行们也丰富了我对许多未被主流经济学“惠顾的领域”的探究。

全世界的同行们都就本书中的论点提供了反馈意见。他们都对本书产生了影响，或是直接通过争论，或是通过提供让另类观点得以发展壮大的论坛，但书中可能包含的错误与他们毫无关系。我感谢特朗德·安德烈森，乔治·阿基罗斯，托尼·阿斯普洛毛戈斯，乔安妮·阿弗里尔，奥尔多·巴拉蒂尼，比尔·巴尼特，詹姆斯·迪克，马凯撒·戴，杰夫·菲施伯恩，约翰·盖利斯，里克·霍尔特，朱里奥·瓦图，艾伦·伊萨克，詹姆斯·朱尼珀，格特·凯勒，约翰·莱格，杰里·利维，亨利·刘，巴锡尔·穆尔，马克-安德烈·皮金，克利福德·波伊罗特，贾森·波茨，巴克利·罗瑟，冈纳·托马森，肖恩·图希，罗伯特·维恩纽，格拉汉姆·怀特和卡尔·怀德奎斯特，他们阅读了本书初稿并进行了评论。我也特别想感谢卡尔·怀德奎斯特为一些争论的内容和思路提供了详尽的建议，感谢约翰·莱格协助为一些论点提供证据，感谢艾伦·伊萨克为前几章的论点提供评价方法，感谢杰夫·菲施伯恩多年来对经济理论的睿智而重要的探究讨论。

乔伊斯·希钦斯就如何让不曾学过经济学的人们也能看懂本书中的论战与理论战提供了宝贵意见。

我的出版商，普卢托出版社的托尼·穆尔和泽德书社的罗伯特·莫尔蒂奴，给了我极大鼓励和重要建议。本书的编辑迈克尔·沃尔工作出色，使成书比初稿更加简洁易懂。

西悉尼大学给我的学术休假，使我摆脱日常学术杂务，有时间成书。纽约巴德学院的杰罗姆利维研究所和挪威特隆赫姆的挪威科技大学，在我对书稿进行最后润色期间给予了我盛情接待。

所以，开战吧！

中文版序言

对任何一个作者来说，一本书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都是一种荣幸。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关键时刻，我的好友霍彦立教授和他的同事翻译了我的《经济学辨析》一书，并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我欣喜异常！

你也许很好奇，为什么这本叫做《经济学辨析》的书值得翻译成中文？我所能给出的最好不过的理由是，20 世纪末的十年间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表现的对比；这一对比表明，比起俄罗斯，中国选择了更适合发展的经济道路。在这十年间，两国都从中央计划转向混合经济制度，结果却迥异。中国向更为市场化的经济制度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俄罗斯的情况则不太好，到上个世纪末，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状况比苏联末期严重地恶化。

是什么导致了中俄两国在各自向混合经济转型中出现了巨大差异呢？幼稚的人可能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是因为中国遵从了专家的建议而俄罗斯则不然——这里所说的“专家”是指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学家。

这种差别的确是因为其中一个国家“遵从了专家的建议”而另外一个国家没有。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遵从专家建议”的国家恰恰是俄罗斯！中国，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一种混合经济体制，远比俄罗斯走西方经济学家所确定的道路成功。因此，西方的经济建议肯定出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至少在我们把它应用于转型经济时是这样的。这也是《经济学辨析》对当今之中国意义重大的原因所在。

一言以蔽之，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理论是有缺陷的。既然这一理论本身有缺陷，那么，据此所提出的任何建议都可能产生误导——俄罗斯转型期间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所获得的建议就是最清楚不过的例子。《经济学辨析》就是要揭示这一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成为市场经济的错误模型的原因。

阅读了这本书，你将会了解到，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缺陷有多种多样、形形色色。如果说这些缺陷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这一理论忽略了时间这一因素。在中国走缓慢稳妥的道路期间，西方经济学家对俄罗斯通向市场经济的高速所倾注的热情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俄罗斯高速转向市场的悲剧出现之后

的故事，可以简要地说明为何中国应该继续对这些西方经济理论持怀疑态度。

中俄两国转型的显著差异，是俄罗斯转型的高速。新古典经济学家鼓励这种高速，他们告诉俄罗斯，转型越快，效果越好。为俄罗斯经济转型出谋划策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就有现任的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院长杰弗里·萨克斯。在一篇发表于1992年的文章中，萨克斯强调，保证改革可靠性的一个方面就是高速度。

人们也许认为，既然速度是萨克斯所给的一项重要建议，他和其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一定将渐进与急速转型的影响模型化，并且起码在模型上显示后者明显优于前者。但事实上，为经济学家指引航向的各种模型实际都忽视了时间。这些模型不考察经济政策变动之后经济所可能运行的时间路径，而是推定经济将快速地从—个均衡到达另—个均衡，这种变动的时间路径被忽略了。

瞬时变动的假定，是西方经济学的这一居支配地位的思想流派自其19世纪70年代开始以来始终存在的一根软肋。然而，俄罗斯却格外倒霉，它的转型时期恰逢这一居支配地位的思想学派中的“理性预期”概念的影响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知识风潮把新古典学派的漠视时间的方法推向了新的危险高度。

“理性预期”认为，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以理性的方式形成预期——这话本身倒没有什么不当。当然，经济体系中必定也有一些非理性的人，不过在构建经济的模型时，重视这些非理性人的行为将是愚蠢的。

然而，在像萨克斯这样的经济学家那里，“理性预期”一词则意味着**准确地预测经济未来的能力**。最先提出“理性预期假说”的是约翰·穆斯，他假定，除了一些随机错误，人们对未来的预测是准确的。当这一假定被纳入标准经济模型时，它意味着模型总是处于均衡状态（或者随机和意外的冲击影响使其只发生微弱的偏离）。甚至新古典经济学曾经承认涉及时间的各种过程——比如当供给条件变化市场上从一种价格到另一种价格的运动——在“理性预期”假定下变成了瞬时发生的事情。

20世纪70年代早期，托马斯·萨金特、尼尔·华莱士和罗伯特·卢卡斯三个更年轻的经济学家一起已经在推广穆斯的假说，到了80年代中期这一假说支配了西方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建议以高速进行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他们基于这样的信条，即世界上都是能够预知未来的人。如果人们无所不知，那么为何要浪费他们的时间使从一种社会制度到另—种社会制度的转型拖拖拉拉呢？变革—夜之间完成，面对新体制人们即刻就会选择适当的“档位”。

尽管理性预期后来在西方失宠了，但我预料，那些曾经信奉这一理论的人们

会这么申辩说，他们的观点远比我在此归纳的细微深刻。恕我不能苟同。虽然他们偶尔也对急速转型表示担心，但总的来讲，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代理人”能够迅速适应他们面对的任何变革，并且变革实施得越快效果越好。让我们看看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家默里·沃尔夫森在其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就俄罗斯转型该多快的讨论。他的一个建议是：

中央计划人员看来应该立即辞职并且关门大吉。他们的离去将清晰昭示市场立即走向均衡。（沃尔夫森1992：37；附加强调）

这段话隐含着这样的观点，即俄罗斯开创市场经济所必需做的一切，就是关闭其中央计划系统。事实上，市场需要大量的法律、政治和物质基础设施。西方经济学家应该对此心知肚明，因为他们毕竟生活在发达的市场（更准确地讲，是混合型）经济之中。但市场的新古典版本，只是一个乡村集市，农夫和手艺人一大早带着货物来赶集，经过讨价还价，傍晚时分卖完回家。因而，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注意到，在可以发挥作用的市場基础设施到位之前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停止中央计划“建议市场立即走向均衡”的论述里明显包含这样的信条，即市场过程是瞬时发生的。存在的模糊之处是，“均衡”本身的含混不清。正如在本书中随后讨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提供的市场体制的模型之所以如此糟糕，其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这种含混不清的存在。

沃尔夫森在这篇文章中关于渐进转型方法的论述表明，经济学家是非常依赖于这样的“理性预期”信条，即人们都是无所不知的（以及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里时间的作用是何等的微不足道）。他的渐进方案必将失败这一论点，极大地依赖于“理性和很有知识经济代理人”推测的行动。如我所指出的那样，他所说的“理性”就是普通人所说的“预言”：对一个人尚未进入其中的体制，他们何以获得关于该体制如此广博的知识，甚至于在该体制存在之前就能够预测其运行（以及其中的价格）呢？

沃尔夫森的政策建议，就像他的简单化了的实际分析一样，具有说教性和极端性。他提出：

理性预期的一个结论是，冷火鸡式地放弃共产主义，是从A到B的唯一途径。^① 实践中，政府必须使其国家货币可兑换并且允许它在合法市场和黑市上流通，放弃补贴制、直接计划和配额，关闭无竞争力的工厂，即使引起一些不公平也要快速实施工业私有化，严格控制货币供给，允许商品和劳务在国内、国际市

① 冷火鸡意思是“突然停止做那些习惯做的事，一下子戒掉原来上瘾的习惯”——译者注。

场上自行定价。(沃尔夫森 1992: 39)

沃尔夫森确实对他的论点进行了修改,对现实做了一些让步,但到头来,他的论点仍然是“速度就是一切”,依然相信不是人而是由上帝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特性并以此为依据。

虽然,沃尔夫森远称不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大腕儿级人物,但正如乔治·斯蒂格利茨在其《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些提供建议并帮助实施实际转型的经济学家中,沃尔夫森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实际转型过程也比试图发起变革的沃尔夫森所提出的简单化建议更加微妙。不过,总的来说,俄罗斯进行了过于迅速的转型。当这种急速面对国际竞争的时候,并没有实现理性预期经济学的虚幻景象,它所带来的后果是,前苏联消费者一旦接触到西方产品,俄罗斯的工厂便同其西方对手短兵相接。

如果给予俄国工厂时间,引入现代生产技术、产品以及加工控制方法,那么基于时间的分析方法反而支持渐进转型。时间将被赋予市场体制中分配和交换框架的形式:批发零售体系、尊重书面合同、消费者保护制度、交易法、信贷额度,破产法等。

很不幸的是,对于俄罗斯来说,实际转型在慌乱中进行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形成的市场体系只是那些在前社会主义体制中业已存在的市场体系——黑市,它当时一直存在,用以润滑饱受短缺困扰的苏联制度之轮,正像市场的侵扰冲破封建制度使资本主义得以在欧洲发展一样。这使得一些犯罪团伙在企业家活动中争取了主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家活动则广泛而深入。

当然,有关俄罗斯的失败与中国的成功的故事不只限于我上面所讲到的那些。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忽视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需要稳妥渐进,显然仅这一点就使它发挥了消极作用,并且使其它许多问题更加严重。俄罗斯问题专家马歇尔·戈德曼在考察探讨中俄两国对消费品生产所给予的不同重视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在促进消费品生产和关闭低效率国有企业两者之间,俄罗斯的“专家们”更热衷于后者。

相反,中国在增加消费品生产的同时保证国有企业的运转。这两项密切相关的政策产生了不少好的影响。戈德曼对西方经济学家给俄罗斯推荐的道路和中国道路之间的不同进行了精炼的总结:

中国的经验表明,休克疗法并非必由之路。休克疗法者告诫我们,一步一步来的渐进经济改革就像分两步走跨越深渊,而中国渐进改革者的反应是,经济改

革应该像摸着石头过河，摸到一块儿石头前进一步。（戈德曼 1996：210）

中国采取的渐进法之所以取得了成功，不是因为它符合西方经济理论，而是因为它反其道而行之。虽然西方经济理论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学学生的学习内容——以及中国的一般学术讨论的内容，但这仅仅是因为中国如今实行更为市场化的经济。我希望《经济学辨析》让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这一理论产生怀疑。中国，正如在其改革中所做的那样，不应该对西方观念囫圇吞枣，而应该尝试着建立起自己的、现实的市场运行模式。

斯蒂夫·基恩

2005 年 2 月

译者序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法商学院位于悉尼西郊，那里一派田园风光：灿烂的阳光透过冰山般洁白壮丽的云朵洒向大地；浓浓的绿色越过湖泊河流、绕过栅栏环绕鲜花簇拥的人家一直涌动到视野的尽头，消失在远方山峦与白云之间……；环境十分宁静、极其优美，的确是一个读书学习、科学研究的好地方。我在那里结识了本书的作者斯蒂夫·基恩，他把《经济学辨析》作为见面礼赠送于我。

斯蒂夫·基恩是一位独行其道的经济学家。在本书中，他用怀疑主义的眼光审视经济理论与实践，以使客骑士的豪迈淋漓尽致地剖析新古典正统经济理论的缺陷以及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政策的各种弊端。他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充斥着逻辑矛盾、貌似有理的假设、令人晕头转向的观念以及与经验数据相左的预测。”他指出，“经济学本应该是一门令人激动、充满知识挑战的学科”，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将气势磅礴的大厦建在腐朽脆弱的根基之上；”“静态经济分析法对动态的经济现象的分析是无效的，因而，从静态经济推理而来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危害而不是有助于现实经济；”“它给已经麻烦重重的社会雪上加霜：更不公平，更不稳定和更低‘效率’”。

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材安排和教学方法，他觉得是在误导学生。“在高级课程中，大量的评判性资料被轻易地省略掉，同时，昭然可见的逻辑缺陷又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假定所掩饰。”“经济学学生硕士或博士毕业，其对经济学的理解也是空疏无物，既不了解所修学科的知识历史，也没有掌握数学的方法。”“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既没有足够扎实的文字功底，也无足够的数理计量功力。”他强调，“经济理论应该思考重视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以及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的方式。”

他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在于，“能鼓励经济学家们以正确、认真、冷静的态度对待经济理论，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接受这些经济理论时太缺乏评判思维了。”他致力于打破正统经济学的思维霸权，因为他认为，“如果能打破传统思维的霸主地位，那么，就像人类自第五世纪就开始在资本主义的海洋上航行一样，经济学家就可能最终为这一险象丛生的海洋绘制出一幅真实的地图。这并不意味着可

以避免定期袭扰它的狂风，但起码在未来我们不会驾船全速冲向冰山。”他希望“中国，正如在其改革中所做的那样，不应该对西方观念囫囵吞枣，而应该尝试着建立起自己的、现实的市场运行模式。”

相对于大行其道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主旋律，斯蒂夫·基恩的声音也许属于另类，属于无法与主旋律保持一致的“不和谐音”。然而，恭听另类的声音，确保少数人的话语权，让人们根据自己感知的旋律节奏翩翩起舞，不仅是自由民主价值的体现，而且有助于避免治学之道、治国之策误入歧途。毕竟，兼听则明！正如，约翰·斯图亚特所说：“当人们被迫听取两方面意见时，总是有希望的；一旦他们只听一面之词，谬误就凝固成偏见了”。翻译此书的目的也正在于彰显一种兼容并蓄的精神，并为经济学者、学生和普通读者增添一个审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视角，避免把谬误当真理、让谬误成偏见。

本书的翻译曾经得到高鸿业先生的大力支持。高先生德高望重却平易近人、学贯中西而谦逊不遑，实为我等后辈之楷模，能得到他的支持并担任翻译出版顾问，我们深感荣幸！遗憾的是，在本书即将出版之时，闻悉尊敬的高先生溘然长逝，哀痛不已……谨以此书寄托我们无尽的哀思！王艳萍教授，是我多年的同事，其快人快语、刻苦严谨让我印象深刻，她不仅认真翻译，而且还为本书的出版牵线搭桥并不厌其烦处理有关事务；校对董红霞、牛筱颖女士，其一丝不苟、诸多点睛之笔，为本书译文增光添彩；编辑张晓楹和吴航斌先生，其远见卓识、精益求精、当机立断，使本书得以适时闪亮登场；作者斯蒂夫·基恩君子般重义轻利，不计稿酬授权翻译出版此书并且专门为本书的中文版撰写序言和后记，其中显示着他对我国经济改革与经济理论建设的高度关注。其实，早在1980年，他就在北京组织了第一届“中澳新闻研讨会”，增进中澳两国间的交流、理解与友谊。对上述诸位的辛劳与贡献，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翻译工作具体分工为：中文版序言、序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后记和封底由霍彦立翻译；第三章、第四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由王艳萍翻译；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由聂正彦翻译。

当然，全文翻译此书，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赞成作者的全部观点。我们就像酿酒师，不一定喜欢和能够享用自己所加工的所有琼浆，但绝对不能只顾一己偏好仅仅酿造自己所偏爱的玉液。

本书是否是一杯美酒？不敢轻易断言，但它肯定是一杯烈酒，味道与众不同，也许还有点儿苦，因此，请慢用！

霍彦立